

圣经文学研究:原理和实践

梁 工

内容提要:圣经兼具神学—伦理学、史学、文学三重性质,其大部分篇幅不同程度地合乎“纯文学”定义。圣经基本上用古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写成,有一套复杂的文学规则,难以为现代读者所驾驭,而特别需要文学批评家的引导。文学研究不仅是进行神学思辨的必要前提,而且能开拓理解圣经神学的新途径。从文学角度进行的圣经研究古已有之且绵延不绝,20世纪中期以后呈现出繁荣兴盛的新局面。当代中国内地的圣经文学研究取得了多方面成就,也存在不少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关键词:圣经文学;文学研究;语言;审美;圣经神学

Biblical Literature Studie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Liang Gong

Abstract: The Bible has triplex qualities of theological-ethnic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and most of its qualities con-

form to the definition of "belles-lettres" in different degrees. Written basically by ancient Hebrews and Greeks, the Bible has a set of complex literature rules, which is hard for modern readers to grasp, that is, particularly needs literature critics to channel off. Literature study is not only an essential precondition of theological thinking, however, that being said, it can also carve out a new approach to comprehend biblical theology. Studies on the Bible from the angle of literature are of long standing and continue until now, and it has presented a booming phase since 1950s. Modern Chinese biblical scholars in the mainland have acquired some achievements, but also have some problems, therefore, it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developed further.

Key Words: biblical literature; literature studies; language; aesthetic; biblical theology

在基督教的视野中,圣经是至高真理的文字载体,承载了上帝的神圣启示。在非宗教界的人文学者看来,圣经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遗产,与体现出人类智慧的主要经典(古希腊文史哲著作、印度两大史诗、中国四书五经、莎士比亚戏剧、托尔斯泰小说等)具有充分的可比性,能够在同一个层面上解读和研究。“把圣经作为文学来读,不应使那些持宗教见解者感到不悦,也不求那些自持己见、对圣经抱怀疑或不明朗态度的人全然接受。无论宗教信仰如何,圣经是我们大家的共同遗产。我们应当从某些方面研究它,而不宜陷入宗教论争之中”;^①最后则殊途同归,都从中采

① John B. Gabel & Charles B. Wheeler,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

掘文明的资源而服务于当下的人类精神提升和文化建设。

一、圣经文学研究的学理依据

圣经作为古代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百科全书，具有多重性质，其中最重要的是三种：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它是神学—伦理学典籍；从历史角度看，它是史学典籍；从语言和审美角度看，它还是文学典籍。^①这三种性质是同时并存的，而非孤立或单一地呈现于不同卷籍或篇章之中；但就某个特定段落而言，又往往以一种为主，而以另外两种为辅。以“亚伯拉罕燔祭献子”（创22：1—13）为例，它既是张扬信仰、引导人效法亚伯拉罕无条件信奉上帝的神学—伦理学文本，也是记载希伯来始祖事迹的历史文本，还是个性鲜明、情节生动的人物故事。至于它的主导性质，研究者可以从不同角度出发见仁见智，分别瞩目于神学—伦理学、史学或文学。

神学—伦理学著作无疑是圣经的根本性质。在基督教文化覆盖地区，至少有六类宗教观念能追溯到圣经：神圣历史观、神学教义、伦理道德准则、教会活动守则、末世思想、个人行为规范。^②基督徒将圣经尊为须臾不可离弃的精神食粮。赵紫宸论及其读经动机时说：“圣经是生命之书，我读是为要得生命，要从这生命利己利人，救国济世。”^③在他看来，读经的首要目标乃是灵性更新，亦即人格更新；其次还要以更新了的人格投身于社会变革，促成一个完美社会的到来。吴雷川也自述读经是为了确立信仰，以求自

① 参见 Leland Ryken, *Words of Delight: A Literary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Book House, 1987), 14.

② John B. Gabel & Charles B. Wheeler,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249-250.

③ 赵紫宸等：《我为什么要读圣经？用什么方法读圣经？》，载《生命月刊》第1卷第6期，1921，第1页。

身得救,进而以基督教的真理改造社会、救济民生。^①至于读经方法,赵紫宸主张将历史阐释与个人体验相结合,不仅了解圣经成书时的历史处境,还要用“宗教的虔心”与耶稣基督和上帝进行心灵沟通。吴雷川进而主张采纳与时俱进的姿态,读出经文的当下意义,即所谓“我常盼望我的知识能随着世界进化,也能就着现世界的情形,与圣经上所说的事理相印证”。^②可见圣经不但是基督徒的生命之粮,而且能源源不断、永不枯竭地为之提供生命之粮。阿巴·埃班称“犹太人不是忠于某个世俗统治者,而是忠于一个理想,一种生活方式,一部圣书”。^③与犹太人类似,基督徒也属于“圣书的子民”,这使“圣经对规定基督徒的身份起着独特的、最重要的作用”。^④

圣经又是一部史学巨著,是考察希伯来民族史、古代犹太教和初期基督教成长历程的基本依据。正是借助于其中负载的历史信息,研究者们勾勒出有关古犹太历史变迁和初期教会发展的历史图景,并揭示出隐寓于圣经中的历史观念,如谓世界起源于一个美好的开端,《创世记》称之为“伊甸园”;最终会发展到一个理想化的未来,《启示录》称之为“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城”。在二者之间,世界经历了一个“败坏”的过程(创6:11—12),即所谓“堕落”、“疏离”或“异化”的过程,于是需要上帝救赎,遂导致“救恩史”或“圣史”的形成和延伸。

与此同时,圣经还是一部文学典籍。何谓“文学”?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说,“文学是一切口头或书面语言行为和作品的统称”,^⑤即所谓“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曰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

-
- ① 吴雷川:《人格——耶稣与孔子》,载《生命月刊》第5卷第3期,1925,第5页。
 ② 参见赵紫宸等:《我为什么要读圣经?用什么方法读圣经?》,第1页。
 ③ 阿巴·埃班:《犹太史》,阎瑞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220页。
 ④ 谢大卫:《圣书的子民》,李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前言第4页。
 ⑤ 重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4,第70页。

学”。^①不少西方学者亦持此见,如称“文学研究不仅与文明史的研究密切相关,而且实在和它就是一回事。……只要研究的内容是印刷或手抄的材料,是大部分历史主要依据的材料,那么,这种研究就是文学研究”。^②毋庸置疑,圣经完全合乎这一定义,因为它的《旧约》大体上用希伯来文写成,《新约》主要用希腊文写成,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作者运用语言手段对世界的感知、认识和理解。需要说明的是,此种“文学”基本上与“文化”同义,用于界定圣经时,是说它类似于各种史学、哲学、政治学、伦理学、修辞学著作,都是人类书面文化的产物。这种界定显然有失浮泛,因其缺乏对狭义文学之特殊审美品质的关注。

狭义的文学指近代以来人们对所谓“纯文学”即诗歌、小说、散文等的统称,基本特征在于“不但诉诸语言,而且包含情感、虚构和想象等综合因素”。^③必须承认,整体上的圣经文献有别于这种狭义文学或纯文学。然而“狭义文学”概念对于理解圣经的文学典籍性质依然不无启迪,具体表现为,其一,圣经中的叙事作品(神话、传说、史诗、史传文学、故事书、福音书、《使徒行传》等)和诗歌(《诗篇》、《耶利米哀歌》、《雅歌》、《约伯记》等)皆有浓烈的情感性和不同程度的虚构想象性,(至少其中部分篇章)等同或接近于狭义文学;其二,除叙事作品和诗歌外,圣经中所余的先知书、启示著作和使徒书信均属于论说性散文(其中先知书尤其启示著作亦不乏某些叙事要素),也有很强的情感性和一定程度的虚构想象性,与近现代论说文学不无相通之处;其三,圣经中远离狭义文学定义的是一批星散于史传文学中的族谱(或家谱)、人名录、典章律例条文等,但它们皆未独立成卷,而是穿插于特定的故事情节之中,成为某篇叙事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马太福音》

① 章炳麟:《文学总略(中)》,章见伊校,浙江图书馆校刊,第55页。

② 韦勒克等:《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第7页。

③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4,第70页。

和《路加福音》中都有耶稣家谱，若孤立地考察，它本身算不上狭义文学，但若将其置于耶稣降生的故事情节中，它便转换为对耶稣身世的宏观概述，从而被赋予某种文学意味。借鉴原型批评大师弗莱的观点，圣经全书乃是一部从上帝创世到未来新天新地降临的“神圣喜剧”：

我们可以把整部圣经看成一部“神圣喜剧”，它被包含在一个这样的U形故事结构之中：在《创世记》之初，人类失去了生命树和生命之水；到《启示录》结尾处重新获得了它们。在此首尾之间是以色列的故事。^①

在如此一部规模宏大的叙事中，间或出现某些非文学性要素，应当无损其总体上的文学性质。

除了文体方面的考察，还有必要从语言角度加以论证。海德格尔说过名言：“任何存在者的存在都居住于词语之中。……语言是存在之家。”^②他笃信语言是一切存在者的栖居之所，甚至是上帝栖居的家园，此说对当代人文科学研究影响深远。其实，圣经作者对语言的本体论性质及其卓越功能早就别有一番体验，在他们的观念中，宇宙万物皆由上帝用语言创造，上帝在历史中的计划也透过语言向世人彰显。福音书作者认定“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的圣言，亦即上帝本身；“道”以肉身降世进入历史，则是圣子耶稣基督（约1：1，2，14）。这种见解致使圣经作者敬畏语言，慎待语言，小心翼翼地运作语言，以求借助于行之有效的文学策略，把恒久不变的真理揭示出来。罗伯特·奥特坚称圣经故事是以合乎审美规范的语言，运用多种文学技巧写成的，故而吁请读者学会

① 诺思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郝振益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20页。

②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1987，第134页。

把圣经篇章“当作故事去充分地享受”，^①在美的享受中深化对上帝、人类和历史范畴的认识。他和弗兰克·科莫德在为《圣经文学指南》撰写的导言中进一步指出，之所以有必要从文学进路研究圣经，是由于圣经乃是一部用语言文字写成的书；与普通书籍类似，它也是通过文学手段获得表意效果的。“不论我们为圣经赋予何种精神价值（诸如报道了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确立了宗教的基础，乃是伦理道德的指南，还是远古人类和社会的见证等等），都依旧如此。的确，文学解析必须先行，因为只有正确地理解了文本所传达的内容，才可能理解其他方面的诸多价值”。^②

人类的所有文化形态固然无一例外地必须诉诸于语言的外壳，然而文学的语言构成却显得特别复杂。文学语言与其他学科诸如哲学、法律甚至自然科学的语言并非没有重叠之处，而它却有着自身的显著特征。就其外在面貌而言，它的词汇、句子、段落和篇章在某种遣词造句和布局谋篇的语法规则制约下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看上去与哲学、法律及自然科学文本并无不同。然而进入文学世界内部，细细考究，却能发现它拥有别具一格的语言性质。形象和思辨、情感和理智、隐喻和直白、含混和明晰……纵横交错地纠结缠绕在一起，其间涉及各种文类体裁、结构样式、表达方式、修辞技巧、叙述视角、抒情韵律、风格语气和寓意象征，它们彼此制约又交相辉映，共同营造出意义的家园和观念的世界。不难理解，倘若离开文学批评家的指点迷津，要想真正走进这个家园，融入这个世界，观其万千气象而领会个中的堂奥，是难以遂心如意的。论及圣经，这部皇皇巨著陆续形成于距今大约两千年前的古代，用远离现代文明的冷僻文字——古希腊来文和

① 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189.

② Robert Alter & Frank Kermode ed., *The Literary Guide to the Bibl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Introduction," 2.

希腊文写成,其文学运作、语法修辞的潜在规则无疑更为现代读者所难以驾驭,^①由此也就更需要文学批评家的引导。

圣经文学研究既然如此重要,千百年来何以一直处于边缘位置?这是因为,人们对它与神学思辨的关系一直存在模糊认识。对于许多人来说,圣经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然是独一无二的圣书,只能以仅仅适用于圣经的特殊方式阅读并研讨。当得知有人要像解读莎士比亚戏剧那样解读圣经时,他们会发出疑问:“莎士比亚能拯救我们吗?”^②言外之意是,由于莎士比亚不能拯救我们,也就不能用研究莎剧的方式研究圣经。对此,笔者的回应一如罗森堡(J. Rosenberg)所论,“圣经作为一部宗教文献的价值,与其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有着非常密切而且不可分割的关系”;^③亦如罗伯特·奥特之言,“圣经是文学艺术与神学、伦理和历史思辨等不同观点的彻底融合;若想把后者(神学等)认识透彻,就必须完全掌握前者(文学)。”^④事实上,圣经的神学意念和史学内容皆须借助于语言手段或文学技巧才能传达,它的“宗教视野正是由于透过散文体小说的各种最精巧的手法来传送,才增加了深度和微妙程度。”^⑤针对一种认为古代叙事质量低劣、漏洞百出的说法,托多罗夫(T.Todorov)指出:“你无论研究哪一部古代叙事,总是读得越仔细,就越是不得不承认这类文献无论在组织结构方面,还是在主题表现方面,都相当复杂而微妙;并能愈益觉得,其作者也意识到必须把话说得巧妙。”^⑥希伯来圣经无疑能够印证这种见解。

① Ibid.,“Introduction,”5.

② John B. Gabel & Charles B. Wheeler,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4.

③ J. Rosenberg, “Meanings, Morals, and Mysteries: Literary Approaches to the Torah.” *Response* 9:2 (Summer 1975), 67-94.

④ 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19.

⑤ Ibid., 22.

⑥ T. Todorov, *The Poetics of Prose*, trans. Richard Howard (Ithaca, New York, 1977), 53. 转引自 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21.

文学研究非但不是可有可无,而且能够开拓理解圣经神学观念的新途径。仅举一例:圣经卷首有两篇创世故事,写的都是上帝创世的经过,但内容、风格和细节却大相径庭。罗伯特·奥特运用文学的“复合手法”之论发表见解,称编者将二者并列起来完全是有意为之,意在“实现最完善的文学效果”,^①因为把不同的画面重叠起来,把互异的视角融合为一,能使读者从更广阔的视野理解上帝、世界和人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上帝既是无所不能、尊贵威严的,又与受造物关系密切,并且主动施恩怜悯。世界是秩序井然、运作有方、美妙和谐的,其资源和地形又呈现出纷乱多变之貌。……人类是受托于上帝管理万物的主人,又是反抗上帝计划的叛徒。”^②至于女人,她既与男人同时被造,与其平分秋色,共同担当管理大地之责;又迟于男人被造,是男人的助手,比男人更容易受到诱惑。

圣经作为神学—伦理学典籍、史学典籍和文学典籍的三重性质势必导致三种类型的研究,对此,勒兰德·莱肯指出:“圣经文本既然是多种文类的综合,显然,对待某个段落就能从不同视野、运用不同方法加以研究。除了依据三重性质思考问题,还必须了解三种诠释途径:神学途径主要关注某个段落中的道德神学观念;历史途径主要关注圣经作者笔下的实际人物和事件;文学途径则聚焦于文本的特色、文本基于感性经验的具象性、对各种文体的运用、素材得以表现的艺术性(对统一性特别强调),以及文学的语言手段。”^③

其实,这三种诠释途径在圣经学术史上始终是并行不悖的,只是在不同时期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一般说来,神学—伦理学

① 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145.

② *Ibid.*, 146-147.

③ Leland Ryken, *Words of Delight: A Literary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Book House, 1987), 14.

诠释绵延始终,19世纪之前一直居主导地位;历史批评于19世纪以后异军突起,取得一系列令人称道的成就;文学研究固然源远流长,却一直是涓涓细流,直到20世纪中期之后引入多种当代文学理论,才致使一批领风气之先的论著相继问世。

二、西方圣经文学研究概览

从文学角度进行的圣经研究古已有之且绵延不绝。大致说来,由于受到不断嬗变的时代文化思潮的制约,18世纪中期以前,人们注意到“圣经中的文学”,主要是一批故事和诗歌;从18世纪下半叶起,开始用历史考据法揭示圣经文本的形成及其正典化过程;20世纪中期以后,又借助于各种现代文论和比较文学理论提供的路径和方法,对圣经进行多维度、多层面的现代观照,并探讨“世界文学中的圣经元素”。

在漫长的释经史中,人们对“圣经文学”的认识一直相对狭窄,只是模糊地意识到圣经中有一批富于文学意味的故事和诗歌,以致那时的文学研究实际上只是神学—伦理学阐释的附从或分支。早在纪元前后,斐洛和约瑟福斯就用希腊的诗歌观念理解希伯来圣经中的诗体作品。^①在犹太释经大典《塔木德》中,“红海胜利歌”(出15:1—18)、“底波拉之歌”(士5章)等被编纂者从其周围的散文叙事中区分出来而排成诗体。^②早期希腊教父奥利金出于诠释《雅歌》寓意的需要而解析其体裁,称之为男女对唱的戏剧。^③尤西比乌斯论及《申命记》32章中的诗歌韵律和节奏;哲罗姆

① Adele Berlin, "Poetry, Hebrew Bible," John H. Hayes (ed.), *Dictionary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vol. 2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9), 291.

② Ibid., 290-291.

③ E. A. Matter, "Song of Songs, Book of," John H. Hayes (ed.), *Dictionary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vol. 2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9), 492.

认为希伯来圣经中的诗歌胜过拉丁诗歌;提欧多发现了某些重复或平行体所具备的修辞用途;奥古斯丁也多次论述圣经诗歌的文体和韵律。^①这些教父讨论圣经诗歌的本意是抵消异教文学的影响,驳斥那种认为圣经缺乏美学素质的论调,但他们的发现却成为日后平行体研究的先声。中世纪犹太学者伊本·以斯拉(Iben Ezra)对《诗篇》、《约伯记》、《箴言》的诗歌文体也进行过论述。^②在此基础上,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罗伯特·洛斯(Robert Lowth)于1753年发表《希伯来圣诗讲演集》,^③多方面考察了希伯来诗歌的特征,论及它们的文体、节奏、类型和功能,指出它们大多用平行体(parallelism)写成,包括同义平行、反义平行、综合平行等,他的论述使世人看到一个别有洞天的诗歌世界。

从18世纪下半叶起,受近代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一批学者从圣经的局部章节转向整体,关注圣经的成书过程,提出圣经是一部由数十卷经籍汇编而成的文集,不但各卷书有其写作、编纂、成书的特殊经历,整部圣经也有汇编、修订、增补、定型的复杂过程。圣经成书后被不断地誊录、抄写、翻译,并以文学研究者公认的各种方式进行阐释和解读,与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等文学经典的际遇大同小异——既然如此,就理应能够着眼于它与历史的关联,对它进行宏观的综览和微观的细读。由此,一个历史批评的新时代悄然而至,且延续将近两个世纪,学者们“将注意力从圣经文本的纪事本身转移到对文本形成方式的解构”,^④所关注的大体是圣经成书以前的际遇:资

① Adele Berlin, "Poetry, Hebrew Bible," John H. Hayes (ed.), *Dictionary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vol. 2, 291.

② Ibid.

③ Robert Lowth, *Lectures on the Sacred Poetry of the Hebrews* (London: Routledge/ Thoemmes Press, 1995).

④ D. F. Tolmie, *Narratology and Biblical Narratives: A Practical Guide*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Scholars Publications, 1999), 1-2.

料来源批评(Source Criticism)意在揭示用以编成最终文本的各种原始资料的面貌;形式批评(Form Criticism)意在分解构成原始资料的各类传说单元,解析其形式特征并描述其赖以流行的社会背景;编修批评(Redaction Criticism)则指出最后编纂者对原始资料进行合并、汇编的方式,及其在编著过程中流露出的神学信念。^①沿着一条理性主义的路线,一代代历史考据学者取得了多项重大成就,使圣经文本的远古面目和编订过程日益明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类研究兼具史学和文学双重性质,就文学性质而言,它所进行的乃是对古典文献之成书经历、作者身份、原初版本和信实文字的考据和甄辨工作。

历史考据法是透视圣经的重要途径,却不是唯一途径。大致说来,它对圣经文本的审美特质关注不够,对圣经与其文化语境之间的相互关联更乏考察,而这两类批评在20世纪却相当活跃。20世纪有“理论的世纪”之称,一系列当代文论此伏彼起,相继风靡学术界,诸如形式主义、现象学、新批评、现代修辞学、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原型批评、文化阐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以及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理论等,这些理论中的一部分以其强大的学术生命力渗入圣经文学研究界,酿成运用新潮文论观照古老经典的种种奇观。^②20世纪中期尤其70年代以后,圣经学术史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圣经的文学面目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认识,文学研究日益迁入圣经学术领域的中心地带;与此同时,“一种相当醒目的嬗变出现了:

① 详见周天和:《新约研究指南(增订本)》,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组教牧事工部,1998,第57—120页;亦见梁工:《圣经叙事艺术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第5—17页。

② Mark Allan Powell, *The Bible and Modern Literature Criticism: A Critical Assessment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New York, Westport,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2), 1-20. 亦见刘意青:《圣经的文学阐释——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78—136页。

曾经被视为世俗文学源头之一的圣经,现在有可能成为文学经典的构成部分”。^①在此过程中,圣经文本以其真实的原貌被人们接受和诠释,如此行动“不仅是对近代学术传统的反拨,也是出自教内学者和世俗学者共同感受到的某种需要”,^②即,有必要把圣经视为具有重大意义和丰富表现力的文学,对以往的研究做出调适。

当代圣经文学研究的又一繁荣景象涉及对圣经与世界文学相互关系的探讨,亦即对“世界文学中的圣经元素”的探究,这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圣经研究,所关注的是希伯来—基督教精神在文学史中的来龙去脉,包括圣经如何多方面接受西亚、北非、南欧上古诸族文学的影响,去粗取精而成为中东新一代文学的结晶,以及圣经成书后如何对后世文学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类研究几乎涵盖所有著名诗人和作家,如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班扬、歌德、雪莱、拜伦、雨果、狄更斯、哈代、劳伦斯、萧伯纳、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T.S.艾略特、福克纳、奥尼尔、布尔加科夫等;重要专著可举出纳希·沙欣的《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圣经资料》、^③谢大卫主编的《英语文学中的圣经传统辞典》、^④勒兰德·莱肯等主编的《圣经意象辞典》^⑤等。

这方面的研究覆盖了一个重要的子课题:圣经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圣经于唐、元、明、清时期数度传入中

① Robert Alter & Frank Kermode (ed.), *The Literary Guide to the Bible*, "Introduction," 3.

② Ibid., "Introduction," 4.

③ Nasseb Shaheen, *Biblical Reference in Shakespeare's Plays*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④ David Lyle Jeffrey, ed., *A Dictionary of Biblical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 (Grand Rapids,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⑤ Leland Ryken, James C. Wilhoit & Tremper Longman III, *Dictionary of Biblical Imagery*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ublishing House, 1998).

国,对中国文化尤其19世纪中叶以来的思想、政治、哲学、伦理、宗教和文学艺术发生了显著的影响。中国近现代作家从圣经中征引典故、选取素材、改写情节、化用人物、推演母题、再现原型、汲取灵感、生发意念,创作出多种带有圣经情结的著名作品。由此,对这批作家作品及相关问题进行研讨,在所难免地成为当代学人关注的学术课题,相关成果可举出路易斯·罗宾逊的《两刃之剑: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小说》、^①艾伦·伊伯等主编的《圣经在现代中国》、^②罗曼·迈勒克主编的《耶稣基督的中国面孔》^③等。

当代西方圣经文学研究的丰硕成果通常从犹太裔学者奥尔巴赫的《模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1957)^④谈起,该书将荷马史诗《奥德赛》对俄底修斯十年漂泊后回到家中的描写与《创世记》中亚伯拉罕燔祭献子的场面进行比较,揭示出圣经叙事之简约、含蕴的文字风格。这一研究开拓了观察圣经的新视野,在圣经与西方文学传统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表明“以往人们对犹太主义与希腊主义的简单比附是错误的,由圣经作者开创的现实主义对于欧洲未来的重要性至少与古希腊文学同等重要”。^⑤同年诺思洛普·弗莱在《批评的剖析》^⑥中否定历史考据学对圣经文本的任意肢解,而主张圣经是一部具有完整构思的文学巨著,从《创世

① 路易斯·罗宾逊:《两刃之剑: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小说》,傅光明、梁刚译,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

② Irene Eber, Sze-kar Wan & Knut Walf (ed.), *The Bible in Modern China: 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1999).

③ Roman Malek (ed.), *The Chinese Face of Jesus Christ*, 4vols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 China-Zentrum, 2002-2006).

④ 埃里奇·奥尔巴赫:《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吴麟绶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第1章。

⑤ Robert Alter & Frank Kermode (ed.), *The Literary Guide to the Bible*, "Introduction," 4.

⑥ 诺思洛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记》一直延伸到《启示录》。1981年罗伯特·奥特发表《圣经的叙事艺术》，侧重通过文本细读揭示希伯来圣经的艺术品质。他从字词、情节、对话、叙述等方面展开论述，^①如谓圣经故事中的每个字、每句话都带有特别的分量，这是由于圣经的文风极其简洁。其作者常用某些关键词揭示故事的道德、心理或神学意义，而很少描述人物外貌，以致一旦刻画某些特别的细节——如以扫浑身赤红长毛，拉结貌美动人，伊矶伦王身躯肥胖等——读者就该注意，那些描写很可能对故事的布局或主题有特殊意义。^②1982年大卫·罗斯和多纳德·米琪合著《作为故事的〈马可福音〉》，^③提出只有把《马可福音》读作一部连贯的叙事，才能体会到它的感人力量。几年后梅厄·斯腾伯格在其《圣经叙事诗学：意识形态的文学与阅读的戏剧性》^④中强调，圣经首先是一部意识形态著作，对它进行任何文学批评都不能无视其宗教背景和神学典籍性质，否则就会偏离圣经的本义。其见解在经典叙事学风靡一时的文论语境中表现出后经典叙事学的某些理论导向，堪称领风气之先。当代西方学者还注重从文学理论层面分析希伯来传统对西方文论的渗透，如苏珊·韩德尔曼在《杀死摩西的人：现代文学理论中出现的拉比解读影响》^⑤中指出，当代文论大家弗洛伊德、拉康、德里达等无一例外地继承和延续了希伯来认知传统。在不少学者对各种新潮文论津津乐道之际，也有人固守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地而拒绝追风，代表人物是勒兰德·莱肯，其著述甚丰，重要的有《如何阅读作为文

① 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22, 178-185.

② Ibid, 180.

③ Rhoads, David and Michie, Donald. *Mark As 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arrative of a Gospel*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2).

④ Meir Sternberg,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⑤ Susan Handelman, *The Slayers of Moses: The Emergence of Rabbinic Interpretation in Modern Literary The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2).

学的圣经》、①《可喜悦的言语:圣经文学导论》②等。

当代圣经文学研究的繁荣气象从近年来国际圣经文学学会年会(SBL Annual Meetings)的盛况中可见一斑。圣经文学学会自1880年创建起几乎每年都举办学术年会,时至2006年,在127年的历史中已经举办了115届。2004、2005、2006年的年会分别召开于美国的圣安东尼奥、费城和华盛顿,正式注册且宣读论文的代表均约2000人,他们在大致200个不同规模的研讨会上发言,每个研讨会又有其专门主题,相关主题则能归结为若干种议题,从中可见当今学者对圣经文学研究的广泛兴趣。③从中还可以看出,大部分选题已超越“纯文学”概念而延伸到普泛的文化范畴,举凡与圣经文本有某种关联的题目都能成为年会上的合法研讨对象。

-
- ① Leland Ryken, *How to Read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Grand Rapids, Michigan: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84).
- ② Leland Ryken, *Words of Delight: A Literary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Book House, 1987).
- ③ 依据2004年年会的会务手册(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4 Annual Meetings, San Antonio, Texas, November 20-23, 2004),笔者将当年研讨的主题分成9大类:1、关于希伯来圣经文本。涉及摩西五经研究、旧约律法研究、历史书研究、申命派史书研究、申命派律法中的性别政治研究、以色列先知文学综合研究、《以赛亚书》研究、《以西结书》的神学视野研究、先知文献与其古代背景的关系研究、十二小先知书研究、《诗篇》研究、智慧文学研究、启示文学研究等。2、关于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涉及《马太福音》研究、《马可福音》研究、《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研究、《约翰福音》研究、同观福音研究、“Q”原材料研究、约翰著作研究、古代文化背景下的约翰启示论研究、耶稣传说研究、历史上的耶稣研究等。3、关于保罗和保罗书信。涉及历史文化中的《罗马书》研究、有争议的保罗书信研究、保罗的灵魂得救论研究、保罗与政治关系研究、基督教神学与保罗书信关系研究等。4、关于犹太教的历史和神学。涉及波斯时代的犹太历史与文学研究、希腊化时代的犹太教研究、早期拉比犹太教的历史与文学研究、库姆兰社团与《死海古卷》研究、《旧约次经》研究、《旧约伪经》研究、希伯来圣经的神学研究、犹太神秘主义起源研究、以色列古代战争研究、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研究、约瑟福斯研究等。5、关于希伯来圣经与古代近东世界。涉及西亚背景下的以色列宗教研究、古代背景下的哀歌研究、埃及学与古代以色列关系研究、第二圣殿时期的社会学(转下页)

三、当代中国内地的圣经文学研究

虽然鲁迅、周作人、闻一多、朱维之等现代学者早在20世纪上半叶对圣经文学就有过精辟的论述,但由于50至70年代内地遭遇长达30年的学术断层,新时期的圣经文学研究事实上是从头起步的。1980年朱维之先生率先撰文《希伯来文学简介——向〈旧约全书〉文学探险》,^④燃响破除坚冰的第一声惊雷。适应于读者迫切了解圣经文学的需要,自80年代中期起,一批圣经故事类图书相继

(接上页)研究、波斯时期之圣殿与宫廷的关系研究、圣经世界中的妇女研究、亚述学与圣经关系研究、考古文献中的圣经地理与民族研究、希伯来圣经的历史与考古研究、希伯来圣经与其同源文学的关系研究、以色列与其同源传统中的智慧研究、圣经历史书与乌加里特文献关系研究、圣经历史书与西北闪族碑铭关系研究、以色列与东地中海世界的智慧文献比较研究等。6、关于《新约》、早期教会与希腊—罗马世界。涉及希腊—罗马宗教研究、希腊—罗马世界的食物研究、希腊道德哲学与早期基督教的关系研究、柏拉图哲学与《新约》教义的关系研究、诺斯替主义与《新约》教义的关系研究、蒲草纸文献背景下的早期基督教研究、古典故事与早期基督教叙事文学的关系研究、福音书与罗马世界的关系研究、罗马帝国背景下的犹太教与早期基督教关系研究、罗马时代的埃及宗教研究、希腊—罗马世界的宗教考古学、君士坦丁大帝之前教会生活的考古学研究、《多马福音》研究、早期犹太裔基督徒研究、早期基督徒家庭生活研究、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渊源研究等。7、关于圣经语言和语言学。涉及圣经希伯来文与语言学研究、圣经希腊文与语言学研究、希伯来圣经经文考据、《新约》经文考据、圣经希伯来诗歌研究、亚兰文研究、马索拉经卷研究、《七十子希腊文译本》及其同类译本研究、圣经词典学研究、圣经翻译研究等。8、关于释经学、释经史、释经理论、释经方法。涉及圣经社会学研究、圣经意识形态批评、圣经生态学批评、圣经符号学批评、圣经读者接受批评、希伯来圣经的新历史主义研究、圣经与文化关系研究、圣经性别视角研究、女性主义释经学、亚洲释经学、非洲释经学、非洲美裔释经学、释经史研究、伦理学释经研究、米德拉西与犹太释经学研究、圣经的运用和影响研究、圣经传播媒介研究等。9、关于圣经研究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关系。涉及圣经研究与电脑技术、网络技术、影视技术、可视性艺术创作的关系等。

④ 朱维之:《希伯来文学简介——向〈旧约全书〉文学探险》,《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2期。

印行,其中问世最早发行量也最大的是张久宣的《圣经故事》,^①累计印数逾100万册。继而几位学者推出研究圣经文学的专著,如朱维之的《圣经文学十二讲》、《古希伯来文学史》等。^②几部海外论著也被介绍到中国,如勒兰德·莱肯的《圣经文学》、^③加百尔等的《圣经文学概论》、^④诺思洛普·弗莱的《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⑤等。圣经文学方面的人才培养工作肇始于80年代中期,朱维之先生在南开大学率先招收硕士研究生,此后河南大学、南开大学不断扩大该方向硕士生的培养规模,并招收相关方向的博士生。此间一批高校(如中国人民大学、河南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建立了基督教文化、圣经文学或犹太文化研究机构,致力于与境内外院校或研究机构的交流合作,联合培养研究生,出版学术著作,举办学术研讨会和专题讲习班,以多种形式推动了圣经—基督教文学研究的发展。2002年9月河南大学圣经文学研究所承办“经典阐释与文化传播学术研讨会”,2005年7月南开大学举办“纪念朱维之教授百年诞辰暨基督教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圣经—基督教文学研究提供了学术讲坛。

以往20多年中国内地圣经文学研究的实绩通过三个主要方面——圣经文本的文学研究、圣经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研究,以及相关领域的理论探讨——体现出来。就文本研究而言,在中国内地,一如在西方,希伯来神话也是最富魅力的学术话题之一。都本海运用结构主义理论从三个层面剖析创世神话的内涵:表层张扬

① 张久宣:《圣经故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初版,1986年修订版。

② 朱维之:《圣经文学十二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朱维之主编:《古希伯来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③ 勒兰德·莱肯:《圣经文学》,徐钟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④ 加百尔等:《圣经中的犹太行迹——圣经文学概论》,梁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

⑤ 诺思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郝振益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了上帝是全能造物主的神学观念，浅层表现出古人渴求理解大自然奥秘的探索精神，深层歌颂了人类谋求成为宇宙主人的英雄气概。^①他在另一篇论文中从三个层次分析了创世神话的审美意义。^②刘连祥运用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探究伊甸园中的大地、花园、泉水、果树、鸟兽、夏娃、智慧树、上帝等文学意象，认为它们共同体现出一种母亲原型的内涵，象征性地塑造出一位慈爱、滋养、深沉、温柔、善良、坚忍，不乏严厉又苦于追求的母亲形象。^③王立新也论及希伯来神话的特质和主题。^④至于其他专题，学者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历史故事、人物形象、希伯来诗歌、语言技巧和审美特征等方面，如张思齐对以斯帖和路得的研究、徐莉华对参孙的研究、周辉对女性形象的研究、刘光耀对《诗篇》的研究、赵宁对《约拿书》的研究、郝岚对《约伯记》的研究、朱韵彬对《雅歌》的研究、刘振江对圣经比喻手法的研究、陆扬对上帝形象的美学研究，以及何乃英对旧约文学特征的研究等。^⑤在这方面，大陆学者也出版了几部内

-
- ① 都本海：《古代人类美好本性的颂歌——〈旧约·六日创世故事〉精华探析》，《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
 - ② 都本海：《〈旧约·众神创世神话〉的审美层次》，《民间文学论坛》1987年第5期。
 - ③ 刘连祥：《圣经伊甸园神话和母亲原型》，《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
 - ④ 王立新：《特质、文本与主题：希伯来神话研究三题》，载《圣经与文学阐释》，梁工等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 ⑤ 张思齐：《论以斯帖形象的美学意义》，《东方丛刊》1999年第2期。张思齐：《论路得亲情观的诗意表达》，《东方丛刊》2002年第3期。徐莉华：《参孙悲剧的心理效应》，《成都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周辉：《试谈〈旧约〉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刘光耀：《“我”与“我一你”：论〈诗篇〉的诗学意义》，载《圣经与文学阐释》。赵宁：《〈约拿书〉的神话与“非神话化”阐释》，出处同上。郝岚：《〈约伯记〉的戏剧叙事》，《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5期。朱韵彬：《〈圣经·雅歌〉诗新说》，《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2期。刘振江：《圣经中的比喻》，《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陆扬：《圣经上帝形象美学考》，《东方丛刊》1997年第3期。何乃英：《旧约文学特征刍议》，《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

容充实的专著,如朱韵彬对古希伯来诗人诗作的论述、^①张朝柯对希伯来民间文学的研讨等。^②

谈及圣经与世界文学的比较研究,一个重要背景是,中国新时期圣经文学研究的兴起与比较文学的复兴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启迪和技术支撑。这方面的成果不胜枚举,就圣经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而言,学者们着力厘清的基本问题是这部巨著如何接受前代文化的滋养而成书,形成传世的定本;一经成书又怎样改变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文学发展的进程。孙承熙对希伯来创世神话做出溯源(上溯至巴比伦时期)和探流(下探至伊斯兰教诞生时期)的双向考察,认为“闪族文化延续数千年而未中断”,其间经历了“三个较为明显的演变阶段”。^③胡志明、陈惇等则做出精彩的个案分析,分别论及圣经对但丁、莎士比亚等作家作品的影响。^④这方面也有几部专著问世,如孙彩霞对波德莱尔、叶芝、卡夫卡等7位现代派作家的22部名著进行文本细读,令人信服地证明,“现代派文学乃是与圣经的深层精神有着潜隐联系特质的西方现代文学”。^⑤肖四新通过考察莎剧中的圣经人物原型、圣经意向和典故,探讨了莎士比亚在形式方面对基督教艺术的借鉴。^⑥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圣经—基督教文化的关系研究日趋活跃,王建国、王学富等皆有论文发表,^⑦有人(如杨剑龙、许正林等)发表这类论文甚

① 朱韵彬:《圣经诗人及其诗》,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

② 张朝柯:《圣经与希伯来民间文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③ 孙承熙:《巴比伦泥板书、〈旧约·创世记〉和〈古兰经〉中创世神话之比较——兼论闪族宗教观的演变》,《国外文学》1993年第2期。

④ 胡志明:《但丁与基督教文化》,《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陈惇:《莎士比亚与基督教》,《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⑤ 孙景尧:《别开生面的西方现代派名作解读》,载孙彩霞《西方现代派文学与圣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1—2页。

⑥ 肖四新:《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文化》,成都:巴蜀书社,2007,第294—307页。

⑦ 王建国:《寻求与困惑:早期老舍与基督教》,《金陵神学志》1990年第1期。王学富:《冰心“爱的哲学”与基督教》,《金陵神学志》1990年第1期。

至多达数十篇。他们在陈述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发掘出这种影响的重要特征,如超越神学教义而进入文化意念的层面——体现在文学观念上,是宗教启蒙、人的文学和对真善美极致的向往;体现在文学精神上,是宗教人格及情感的伦理化,以及通过忏悔和祈祷表现灵魂的探问。^①在此领域马佳、杨剑龙、王本朝、许正林、王列耀等皆有专著出版,^②唐小林更将视野从作家作品研究上升到诗学理论的高度。^③除了影响研究,也有人尝试对圣经文学与中外文学进行平行比较,得出颇为新颖而深刻的结论。如汪维藩对一批圣经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分门别类地比较后提出:中国和以色列是两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二者的诗魂相互重叠又各具特色;综论之,中国诗歌较为关注民众,热爱人生,希伯来诗歌则更注重神圣的超越和对人生意义的沉思。倘若我们能希伯来诗魂强化自身,人类必将在东方看到一个更加伟大、坚强、卓越而深沉的中华诗魂。^④

再看理论探索。当一些学者执著于实证考察之际,另一些学者更关注理论探索,取得可观的成绩。杨慧林透过“人性与罪”、“理性与罪”、“罪与救赎”说明基督教精神在西方文学中的本质表现,^⑤并运用哲学及神学阐释学对圣经和基督教文化进行深层透视。邱紫华注意到希伯来民族历史的悲剧性与其艺术创作和民族

① 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和基督教文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② 马佳:《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十字架下的徘徊》,南京:学林出版社,1995。杨剑龙:《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王列耀:《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王列耀:《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③ 唐小林:《看不见的签名: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华龄出版社,2004。

④ 汪维藩:《诗魂》,《金陵神学志》1989年第2期。

⑤ 杨慧林:《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116—134页。

精神的非悲剧性之间的二律悖反现象,从宗教信仰角度对其做出自成一家之诠释。^①杨建也从民族意识和审美视角探讨希伯来精神,但使用的关键词不是“非悲剧性”而是“悲喜剧性”。^②刘洪一则探讨了圣经的世界性及其与现代文明的关系。^③正确评价圣经—基督教文化的历史地位,将西方学界视“两希”为欧美文学两大书面源头和精神源流的论断输入国人的观念中,是内地学者取得的又一显著成就,该理论经朱维之先生首先评介、^④马小朝等人阐述引申,^⑤由蒋承勇做出规模化系统化的论述。他指出,希腊、希伯来的文化内核分别与人的自然原欲和理性本质相联系,二者不但有彼此对立的一面,也有互补的一面,这种对立互补性质在欧洲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文学中均有充分表现。^⑥刘建军进而专论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的内在关联,认为基督教文化用信仰方式取代了早期人与人之间的血缘维系方式,发展出近现代的理性维系方式和今天初露端倪的人权维系方式;而西方文学受此制约,在文化精神上体现出从自然人向社会人乃至今天文化意义之人的转换。^⑦内地学者在此领域的另一类工作是对西方圣经文学批评史、批评理论和方法的研讨,刘意青详述了20世纪西方圣经文学研究者奥尔巴赫、弗莱、奥特、斯腾伯

-
- ① 邱紫华:《希伯来民族精神中的非悲剧性》,《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2期。
 ② 杨建:《古代希伯来文学的悲喜剧性及民族意识》,《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6期。
 ③ 刘洪一:《犹太圣经的世界性及其与现代文明的联结》,《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6期。
 ④ 朱维之:《圣经文学的地位和特质》,《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4期。
 ⑤ 马小朝:《希腊神话、圣经的表象世界及其对西方文学的模式意义》,《山东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⑥ 蒋承勇:《西方文学“两希”传统的文化阐释:从古希腊到18世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⑦ 刘建军:《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格、巴尔、韩德尔曼等人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①梁工在其主编的《西方圣经批评引论》^②中亦对西方圣经文学批评简史、圣经阐释学、形式批评、社会学批评、女性主义释经学以及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做出专论。

综上所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的圣经文学研究已经取得长足进展。我们大致了解了圣经文学的总体面貌和主要成就,对希伯来民族及古代犹太教、初期基督教的历史形成了初步认识,对圣经文学与历史和宗教的复杂关系也有所把握。在此基础上对圣经文学与众不同的“文学性”亦形成较深的感知,意识到这是一种用特定语言写成、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既渗透历史元素又饱含个人情感的民族文学。它的规模不算非常庞大,质量却特别精良,以致与古代希腊文学、印度文学、中国文学共同成为世界古典文学的主要体现者,并借助基督教的传播,对后代文学和文化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圣经文学研究带动了西方文学中的“两希”传统研究,使我们形成重构文学史的新思路。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朱维之先生就将“两希”形象地比喻为“哺育婴儿的两只乳房”,^③随后又把这一见解贯彻到文学史的编写中,将希伯来圣经列专章写进亚非文学史,将初期基督教文学作为古罗马文学的一部分写进欧洲文学史。^④今天,对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传统的研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学术界对中世纪、文艺复兴乃至现当代西方文学的理解,使

-
- ① 刘意青:《圣经的文学阐释——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刘意青:《从圣经的文学阐释看文学批评的真理权威性——兼评梅厄·斯腾伯格的〈圣经叙事诗学〉》,《国外文学》2004年第4期。
 - ② 梁工主编:《西方圣经批评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③ 朱维之:《圣经文学的地位和特质》,《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4期。
 - ④ 朱维之主编:《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朱维之主编:《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之能够较为公允地评价这种宗教文化对于欧美文学史的积极建构功能。刘建军进而主张在充分重视基督教文化现象的基础上重写西方文学史：“我们今天所需要的西方文学史的新形态，必须是以西方人的精神发展进程为核心来重新阐释其文学发展规律的关系形态，必须是把西方重要的文化现象——基督教文化现象包含在其中的文学发展形态。”^①这方面的探索还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化。中国文学是在圣经—基督教文化打头阵、各种西方思潮全盘涌入国门的大背景下开始迈进现当代门槛的，能够客观中肯地正视这段历史，无疑标志着中国学术的进步和成熟。

对于一些与圣经文学研究相关的理论问题，我们也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圣经—基督教文化所蕴含的宗教观念在某些层面之所以能成为文明发展的持久推动力，是因为它为人的终极关注找到一种便捷有效的运作模式。人普遍关注的终极存在者——用神学话语表述即“神”或“上帝”——在信徒那里是超自然的崇拜对象，在非信徒那里其实是各种正面理念（如真、善、美、仁慈、正义等）的终极聚合体。既然如此，可以认为，虔信上帝所体现的宗教情怀便能转换为对至善人生的执著追求。我们已经打开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大致看到国外圣经—基督教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初步了解到西方学者的理论和方法、成功的经验和曾经走过的弯路，它们必将成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借鉴。就方法论而言，我们已能突破文学社会学的单一构架，较为娴熟地运用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以及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等，对所论题目做出有一定深度的剖析。

我们还找到颇具民族特色的研究领域，那就是圣经—基督教

① 袁先来：《建构适应21世纪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文学史——刘建军教授访谈录》，《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3期。

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以及二者之间的平行比较研究。对于涉及中国文化的题目,我们在国际论坛上理应最有发言权。如前所述,杨剑龙、许正林、唐小林等人在这方面已取得显著成绩。张思齐对《诗篇·第19篇》和《诗经·天保篇》的比较诠释是平行研究的一个范例。^①陈会亮对《论语》和《摩西五经》的比较研究、^②侯朝阳对梁发的《劝世良言》与圣经的关系研究^③亦隶属于这一范畴。

尤其令人兴奋的是,由于一批内地高校的精心培养,亦受惠于境外院校和研究机构的鼎力支持,一支年轻有为、勤奋向上、生机勃勃的中国圣经文学研究队伍正在迅速成长起来。其中一些人或久或暂地受过境外院校的专门训练,一定程度地掌握了旧约希伯来文和新约希腊文知识,加之自身的中国传统文化积累和中外语言应用能力,他们在各自的研究工作中已经初露锋芒且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诸如游斌、梁慧、陈贻绎、田海华、程小娟、徐雪梅等。

20多年来,中国的圣经文学研究从一块荒芜之地结出相当丰硕的果实,成就是可观且令人欣慰的。然而,缺陷和不足也显而易见。就成果的规模和数量而言,这方面的论述还过于单薄,在外国文学论著索引中常使人感到寥若晨星,这与圣经—基督教文学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应占的比重极不相称。就成果的质量而言,不少论述还停留在一般评介或赏析的水平上,缺乏深刻而富于创见的理性思考。此外,我们的工作中还有许多薄弱环节甚至空白点,例如对《次经》、“伪经”、“死海古卷”和新约典外文献的文学研究。

① 张思齐:《〈圣经·诗篇·第19篇〉与〈诗经·天保篇〉比较研究》,载《圣经与文学阐释》,梁工等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② 陈会亮:《〈论语〉与〈摩西五经〉比较研究》,载《圣经视阈中的东西方文学》,梁工等著,北京:中华书局,2007,第46—101页。

③ 侯朝阳:《梁发的神学思想与进路》,《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第25期,2006。

总起来看,我们远未达到能与国外同行对话的水平,距离这个目标尚有漫漫长路需要跋涉。就研究者的素质而言,我们的学者大都不懂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而离开这个语言基础,就难以摆脱对翻译资料或二手材料的依赖,进而难以实现根本性的突破而取得前沿性成果。

鉴此事实,除了全面深化上述业已开创的研究外,当前有必要扩大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规模,使之真正具备坚实的圣经语言功底、深厚的理论学养和丰富的专业知识;同时做好一系列相关工作,诸如强化专业图书资料建设、增进与海外同行的沟通与对话等,以求在人才培养和成果产出等方面都不断有新收获。在学术理念方面,则要兼容并蓄,和而不同,充分尊重各方学人和各种理论方法,以图全方位地观赏到圣经那“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万千气象。此外,还要牢记立足于本民族文化传统,谋求在跨文化的学术碰撞中扬长避短,不断提出新课题、形成新思路、走出新途径,而不能总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笔者深信,只要脚踏实地地探索一条富于民族特色的学术创新之路,中国的圣经文学研究必能尽快与国际接轨,成为国际学术行列中的合格成员。

(责任编辑 程小娟)

作者梁工,师从朱维之先生攻读圣经文学,在南开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88)。美国圣保罗路德神学院、芝加哥路德神学院访问学者(1994—1995)。现为河南大学圣经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分会副会长。近期代表作有《圣经叙事艺术研究》、《西方圣经批评引论》(主编)、《圣经视阈中的东西方文学》(合著)等。